

# 基辛格在中国受到的礼遇说明了什么

老朋友基辛格访华,受到了中方的热情接待。在官方层面,基辛格作为民间人士获得最高礼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意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会见了他,这也是52年前周恩来总理会见首次访华的基辛格一行的地方。此外,基辛格还得到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国防部长李尚福的会见。而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基辛格访华的消息多次登上热搜,网友们纷纷对他来华表示欢迎,也对他为中美关系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敬意。

从基辛格本人一段时间以来的发言表态来看,他对中美关系当前的发展趋势有着真实的担忧,想必这是他如此年纪仍要坚持出访的情结所系。对于一位百岁高龄的老人仍然不远万里,为中美关系奔波,中国人的第一反应是挺感慨的、觉得挺不容易的。然而在美国那边,既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对“一位公民”比现任美国官员

更容易接触到中方官员“表示遗憾”,还有一些分析人士和媒体称北京在打“老朋友”牌,拉拢那些可能有助于改变华盛顿观点的人,甚至有人宣称这是“中国故意采取的战略”。

在中国人看来,这些说法都极其幼稚可笑。为什么“一位公民”能超越华盛顿的现任官员,得到更高的礼遇和更大的尊重,难道华盛顿自己心里没点数吗?这些年,对华务实理性在美国已经被严重边缘化,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常常是在极端保护主义和各种怨恨情绪的逆流裹挟下四处飘荡、冲撞,中美关系的回旋空间被大大压缩。一百岁的基辛格仍然要在促进中美关系稳定、避免发生冲突方面承担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这一来说明美国的外交智慧后继无人,二来说明中美良性沟通渠道的欠缺。

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

“老”字首先是对他所参与、所见证的中美关系漫长岁月的致敬,其次是对他一直以来关注关心中美关系并希望中美能和平相处的尊重。在中国人看来,只要讲道理、并对中国抱有善意和诚意的人,就是朋友,处久了就是老朋友。几十年来,基辛格上百次来到中国,都受到了友好款待,没有因为他的职务、身份变化而改变。中国给予基辛格的礼遇,是重情、讲义、尊智传统的一贯体现。

美国一些人故意曲解“老朋友”这个词,甚至有人说它是一个陷阱,这反映出美国社会看待中国的不健康心态,以及中美之间缺乏互信的现实。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向基辛格展示的友好和友谊,确实不光是给他一个人的,也是给所有在中美关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有识之士的。我们不但希望理性能主导美国对华政策,而且希

望通过这些老朋友向全体美国人民传达友好的善意和真诚的诚意。

交流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永远不可替代,真交流就要尊重现实、尊重各自的利益基础,而不是一方逼迫另一方全盘接受霸权的过程。基辛格是坚定的美国利益维护者,但他理解美国不能简单地将美国利益等同于世界利益。他几十年对华打交道的经历充分证明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条路不仅走得通,而且也是唯一的正途。近年来基辛格频频对两国关系的危险趋势发出警告,这是基于他半个多世纪经验沉淀和理论研究而得出的政治洞察,值得华盛顿重视。

我们注意到,柯比在20日的记者会上也表示,美国政府官员“期待听取基辛格带回来的消息,听听他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了解到了什么”。希望华盛顿能谦虚、诚恳地好好听一听这位百岁老人带回去的忠告。▲



## 岸田高调的海湾之行,不止为“寻油”

丁隆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日前结束了海湾地区之行,其间访问了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三年多来日本领导人首访中东,引发诸多关注。这三个国家都是世界重要的产油国,也是日本最重要的进口油气来源国。在俄乌冲突造成的能源供应短缺背景下,“寻油”自然是岸田此访的首要目的。然而,从有关此访的日本官方声明和媒体解读来看,似乎并不止于此。

笔者认为,从此访行程与成果看,岸田文雄的海湾之行有三个显性目标。

首先,稳定油气供应。日本是世界第五大石油消费国,其进口石油依赖度达97%。2022年,日本原油进口总量的93%来自中东,其中42%来自沙特阿拉伯,34%来自阿联酋。2023年年初,来自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三国的原油占日本原油进口总量的80%。因此,岸田此行首要目的是在俄乌冲突导致国际能源供应紧张和能源市场前景不确定的背景下,寻求沙特和阿联酋持续稳定地向日本提供原油,并谋求与卡塔尔建立长期液化天然气供应关系。

其次,新能源与脱碳技术合作。此访期间,日本与沙特、阿联酋达成氢、氨能源及脱碳技术合作意向,迎合了正在加速能源转型的海湾国家相关技术需求。沙特和阿联酋致力于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分别提出在2060年和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因此,日本将脱碳技术合作作为在海湾的新“卖点”,希望以技术换能源的方式保障能源安全,拓展经贸合作。

再次,提升经贸关系。此访期间,日本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就启动自贸区谈判达成协议。日本想通过贸易便

利化,加强与海湾国家的经贸关系,提升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

除了以上显性目标,岸田文雄的海湾之行还有更值得关注的隐性地缘政治目标。日本明显看到了近年来海湾国家自身及其与大国关系的剧变,也想要跟着刷一波存在感。

从海湾地区层面看,俄乌冲突后,作为主要能源输出国的海湾国家,已被大国“踏破门槛”,战略自信心和自主性大幅上升。海湾国家开始实施多元平衡战略,在大国间多面下注。随着海湾能源销售市场转向亚洲国家,海湾国家实施“向东看”战略,也为发展与日本的经贸与投资合作提供了机遇。日本注意到海湾国家自身定位与对外战略的变化,试图在新海湾影响力版图上占据一席之地。

从大国中东战略角度看,美国在中东及海湾地区实施战略收缩,让日本看到了在这一地区扩大存在的机会。美国与海湾国家盟友关系松动,众多领域合作水平出现下降,能源方面还形成竞争关系。日本将美国中东政策调整带来的变化视为在中东扩展影响力的机遇,也想趁机拓展政治影响力和市场份额。

日本加快走向海湾地区,还打着所谓“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迅速提升”的旗号。以首届中阿峰会成功举办和促成沙特与伊朗实现历史性和解为标志,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显著上升。“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得到海湾国家积极响应,这引发日本的焦虑。因此,日本官方声明强调此访的重要性,认为海湾之行已刻不容缓,被认为暗指日本

通过此访应对中国中东外交的巨大进展。在日本媒体对此访的报道中,中国是“缺席的在场者”,不少评论从“与中国竞争”的角度解读日本与海湾国家的关系。

这样的论调基于两个视角:一是中日两国与海湾国家的合作重合度较高,竞争性较强。两国与海湾国家合作的主要领域均为能源、经贸、科技等软性方面,技术换能源、技术换市场是两国与海湾合作的主要手段。与美国与海湾国家重点在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有显著区别。

二是日本在中东缺乏独立的战略,很大程度上仍以追随美国为主。加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后,日本开始在中东加强与美国和印度的配合。美国和印度联合一些中东国家组建中东新四方机制(I2U2),希望整合印太与中东,形成板块联动效应,企图以此在中东遏制中国。日本对此乐观其成,甚至甘愿成为美国“印太—中东新战略”的棋子。

对中方而言,在能源、经贸和科技领域,只要日本与海湾国家的相关合作是在公平和市场化条件下开展,中方无意干涉。但需要警惕的是,日本加入美国在中东遏制中国的小圈子,企图借力美国和印度在中东排挤中国,从而坐收渔利。

不过,这种想法只是一厢情愿,也有违海湾国家发展对华关系的战略抉择,注定不会成功。日方需要认清的是,中日各自在海湾的发展互不妨碍,双方在海湾甚至不乏合作空间。日本企图通过加入小圈子,充当美国在中东遏华的“马前卒”是个错误的盘算,对于日本在海湾拓展影响力没有任何好处。▲(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不久前,美国媒体报道的一则消息引起了舆论关注。在今年2月24日,也就是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之际,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社交媒体平台推特发布了一段多种语言的视频广告,内容疑似暗示俄罗斯驻美国的外交官可以通过充当FBI线人乃至间谍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未来”。采用这种此前罕有的公开方式诱导俄外交人员叛国, FBI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这个项目的钱实际并不多,整体预算估计不会超过10万美元规模。美媒透露,考虑到FBI年度预算规模是以百亿美元为单位来计算,所以这样的广告投放只能是长期开展的大规模行动中的一部分。考虑到FBI承担的反间谍职能,这样的广告很明确传递出一个

## 从FBI公开鼓励俄外交官“反水”说起

沈逸

信息,就是鼓励俄罗斯外交官“反水”,帮助美国抓出俄罗斯在美国潜伏的间谍。用在美国中情局秘密部门工作了30年的资深人士道格拉斯·兰顿的话说,这个广告就是公开表示FBI希望找到合适的俄罗斯官员,“帮助美国确定间谍可能在哪里”。另一名中情局资深官员吉姆·奥尔森对美媒表示,这是FBI在“挂牌营业”,“对于每一个美国叛徒、每一个美国间谍,情报部门的成员都知道这个美国人的身份,或者足够了解其泄密内容,以便我们在身份识别方面有迹可循”。

FBI华盛顿分局对此也并不讳言,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媒体明确表示,“联邦调查局将评估所有可用的工具,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要看到,这个广告仅仅是FBI大规模运用社交媒体开展“反间谍行动”的最新进展之一。根据社交媒体Meta广告图书馆等相关机构收集的数据,FBI及其外地分局迄今为止针对俄语使用者的广告,已产生了多达690万次浏览。除了Meta之外,YouTube等平台上也出现这样的广告。当然,因为谷歌公司拒绝分享广告商在其平台投放广告的具体数据,所以还不清楚FBI这一广告具体投放的规模和范围。

从情报—反情报的底层逻

辑上来说,这种招募广告的目标就是鼓励俄罗斯受众叛国,与美国的情报机构合作。也是《招募人员:间谍活动和美国情报部门失落的艺术》一书作者的兰顿就表示,相信联邦调查局在社交媒体上召唤心怀不满的俄罗斯人的持续努力将会得到回报;美国方面展开这种煽动的话语逻辑经历了冷战时期的磨砺,已经非常成熟,即用“爱国”为“叛国”做辩护,将为美国政府服务,提供俄罗斯的情报,用美国的话语逻辑包装为“真正的爱国主义”。

整体来看,这种发布煽动广告、招募叛国者的手段,除了涉及网络社交媒体这种新生事物外,无论是核心逻辑还是目标诉求,都并非什么新鲜事。本质上就是冷战期间美国情报机构反情报工作在数字化时代的持续延伸。当然,考虑到这毕竟是美国,又涉及到联邦调查局这个特殊的机构,其创始人埃德加·胡佛及其创办机构在国家安全领域堪称臭名昭著的暗黑历史,都无疑值得引发人们的警惕。

在冷战时期,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FBI助推了第三次“红色恐慌”在美国国内的泛滥,“非美委员会”推进的政治忠诚审查,成为几代美国人的历史记忆。而当下的华盛顿,在涉及俄罗斯和中国等国的事情上,表现出的偏执、恐慌以及狂躁,不能不让人回想起麦卡锡主义的阴霾。例如,有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被迫辞职离开知名的美国智库,因为华盛顿已经没有了说实话的良好氛围,这可以看作是一个更加微观和具体的缩影。

考虑到社交平台对今天人们生活的重要影响,人们同样有理由担心,如何避免笼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空的麦卡锡主义阴霾造成更大的破坏与损害,如何避免数字时代的网络空间免受还魂的麦卡锡主义肆虐。这应该成为各方必须共同关注、思考及解决的重要问题。▲(作者是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教授)

国际论坛版文章除社评外,均不代表本报观点。欢迎读者参与讨论。电子信箱: taolun@globaltimes.cn

